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八輯 上卷

CSSCI來源集刊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主辦

本卷要目

論 文

- 李建華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
——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內在機制
- 張宗友 論清高宗構建極權帝國文獻體系的歷史背景與制度設計
——《四庫全書》與文獻傳承研究之一
- 徐雁平 清代家集與文化傳統
- 陳岸峰 提壺撫寒柯，遠望復何爲：論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並序》
- 太史文 十王研究的二十年回顧
- 巢彥婷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述論
- 李成晴 《大明一統志》所見唐逸詩考

書 評

- 胡耀飛 中國中古史與東亞史的新拓展
——童嶺主編《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周邊世界》讀後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八輯 上卷

CSSCI來源集刊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主辦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PAPD)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985工程項目經費資助出版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
(10&ZD130)階段性成果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古典文獻研究. 第18輯. 上卷 / 程章燦主編.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506-2306-4

I. ①古… II. ①程… III. ①古文獻學—中國—叢刊
IV. ①G256.1-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75292號

書名	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八輯上卷)
主編	程章燦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bs.com
經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江陽工業園蜀崗西路9號, 郵編: 225008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19.5
字數	403千字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306-4
定價	88.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514-85868858)

主 編 程章燦

編輯委員會 (按姓名音序排列)

曹 虹 陳尚君 陳正宏

程章燦 叢文俊 杜澤遜

郭英德 姜小青 劉玉才

劉躍進 武秀成 徐 俊

徐有富 張湧泉 趙生群

執行編輯 趙 益

目次

• 文獻文化史研究 •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

——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內在機制

..... 李建華(1)

論清高宗構建極權帝國文獻體系的歷史背景與制度設計

——《四庫全書》與文獻傳承研究之一

張宗友(15)

清代家集與文化傳統

徐雁平(38)

一本書的故事與傳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新編對相四言》

影印本序

商 偉(69)

莊一夔《福幼遂生編》的刊刻、流播及其對醫學的貢獻

周煥卿(81)

• 文學及文學文獻研究 •

提壺撫寒柯,遠望復何爲:論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並序》

..... 陳岸峰(101)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述論

..... 巢彥婷(128)

《夾注名賢十抄詩》研評八題

梁太濟(143)

詞集自定與面目自鑄

——《秋林琴雅》、《樊榭山房集》的比較研究

黃浩然(155)

和刻本宋代筆記叢論

卞東波(166)

吳闓生《晚清四十家詩鈔》所收日本漢詩考

高 平(178)

• 文史新研 •

十王研究的二十年回顧

…… (美)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 撰 張 煜 譯(191)

• 文獻考訂 •

慈利楚簡校讀札記	魏宜輝(216)
《新唐書》宋版系統考辨	吳 瓊(223)
《王荊文公詩箋注》引詩正訛續補	陳開林(230)
唐盧象《馬跑神泉》爲宋盧象詩考	楊 柳(248)
《大明一統志》所見唐逸詩考	李成晴(252)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錄文疏失舉正	定 源(王招國)(260)
傅增湘影印故宮善本始末考	趙 嘉(269)
《全元詩》誤收詩人考	石勸言(279)

• 書 評 •

中國中古史與東亞史的新拓展

——童嶺主編《皇帝·單于·士人：中古中國與

周邊世界》讀後

《古典文獻研究》稿約	(304)
《古典文獻研究》稿件書寫格式	(305)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

——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內在機制

李建華

儘管《尚書·多士》已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的記載，但文獻的大規模書寫特別是大量編纂成書則開始於春秋，勃興於戰國。降至戰國中後期，不僅主要經典皆已成書，私家著述並亦載為篇籍，而且書冊之流傳、積聚也有了相當規模。同時，文獻書籍的散佚亦漸次發生。秦火以前，前代故籍和各家著述即有散失不見之篇；入漢以後，秦火不及之書亦大有不能整理恢復之冊。成書、積聚和散佚三位一體，共同組成先秦時期文獻書籍發生、發展的核心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所以成為中國文獻傳統和書籍生產的奠定、發生階段，具有物質、傳統、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竹簡成為文獻的主要載體，簡牘書籍制度形成，不僅使大規模的書寫成為可能，也大大促進了書籍的形成和廣泛傳播。其次是由於方言歧異造就的書面語極早成熟，使書寫記錄的傳統一脈相傳，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再次就是“軸心時代”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知識的積累、傳布和思想的活躍既產生了對書籍的強烈需求，又反過來推動了文獻記載和書籍生產的持續勃興。對此，前人時賢論述已多，毋庸再論。不過，在書籍史的意義上，僅有以上宏觀的認識顯然是不夠的，因為文獻書籍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同時也是一種客觀事物，其發生、發展必然存在着自身規律和內部機制，外在因素只能通過其內在因素發生作用。同時，文獻書籍史的不同時期，其外在表現、自身規律和內部機制又各不相同。如果忽略不論，顯有未當。實際上，就先秦文獻書籍而言，乾嘉以來的相關研究已經頗有涉及其內部特殊性的討論，余嘉錫《古書通例》可稱傑出代表。當代出土材料日新月異，更加促進了對此問題的研究，出現了不少新的認識。本文即在前人時賢的基礎上，再作深入的思考，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 精英教育的發生、強化與經典的編纂成書

社會“精英”既是階級層面上的，也是“知識”意義上的存在。早期社會中

國王、祭司和貴族壟斷知識，隨着社會的進步，“階級”與“知識”的關係程度逐漸降低。就古代中國而言，商及西周在階級上有貴族、平民、奴隸的不同，掌握知識的毫無例外是貴族群體；迄於春秋戰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介於貴族、平民之間的士階層興起，逐漸成為知識文化創造的主要力量，“知識精英”形成。

無論是階級還是知識意義上的精英，其形成和維護都依賴於教育。據文獻記載，至少商代已有貴族學校，入周後更加完備，教育層次出現了“小學”和“大學”的區分。“大學”有更加嚴格的身份限制，“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後選，皆造焉”（《禮記·王制》），用以維繫統治階級的傳承。西周時期學校教育和“王官之學”在性質、功能上已有不同：王官之學重在對“知識”的壟斷、持守與政治應用，而學校教育則是對統治精英的培養亦即“知識”的教育。春秋中葉興起的私學則是士階層和平民中優秀分子的自我教育系統，更加體現出知識教育和傳承的功能，是“知識精英”形成并逐漸發展的重要保障。

春秋時期私學興起發展，諸侯國貴族教育也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來自於兩方面的因素：第一個方面當然是社會進步和知識發展的推動，主要表現在私學上。孔子廣收門徒創立儒學是社會變革促成私學普及的範例，史載春秋早期鄧析教民訴訟或許更能說明社會進步對教育的促進。《呂氏春秋·離謂》曰：“（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①第二個方面則是政治的需求。周室東遷，王綱不振；大國爭霸，小國附盟，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政治本身首先催動了文獻書寫的發展。錢存訓總結曰：“根據《左傳》中的記載，從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前 703 年的 20 年間，便有 50 次會盟、40 次攻伐、35 次朝覲及出使、16 個盟約，以及很多其他交往的記載。這些都是當時的各種檔案和史實的記錄。諸侯和朝廷中的公牘，如征伐、委任、褒揚、廷告等也占有很大的數量。戰時徵兵令亦書於簡策之上。戰績和俘獲，不但書於竹帛，更琢之盤盂，刻勒碑石，以為永久紀念。”^②在尊王攘夷、諸侯稱霸的國際背景下，如此頻繁的盟會、戰爭、社會活動均著於文字，時勢不僅要求貴族士人熟知各種交際禮儀，同時要具備相當的知識水平和文學素養，因此各國均極重視對貴族子弟的教育。

當代學者陳來精闢地指出：“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文本經典的形成或確定，與教育過程中教本的確立有密切關係。”^③此論雖然主要是指出了“經典化”的內在動因，但也道出了“成書化”的驅動所在。所謂“成書”，不僅是指由口耳相傳到書於竹帛，更主要的是指經過系統的編纂、整理並形成一種可以閱讀使用、鈔寫複製乃至傳播的物質成果。“成書化”雖然是具體書籍史意義上的概

①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88 頁。

② 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 頁。

③ 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第 158 頁。

念,但和思想文化史意義上的“經典化”屬於一事之兩面,不可偏廢。

《左傳·僖二十七年》記晉文公為三軍元帥人選徵詢屬下,大夫趙衰曰:

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①

晉文公欣然從之。當時晉國人才濟濟,郤穀所以卓立於衆人者,乃在於能夠掌握《詩》、《書》、《禮》、《樂》。舉薦者趙衰以能文著稱,亦諳熟《詩》、《書》。這說明作為德義載體的《詩》、《書》、《禮》、《樂》在春秋初期不僅被視為經典,而且具有成書形態,已經足以使貴族士人能夠廣泛地獲取。顯然,晉文君臣熟稔且視為經典的《詩》、《書》、《禮》、《樂》無疑已經是當時中原各國的教本。在楚國,《國語·楚語上》記楚莊王為太子箴(後為楚恭王)選擇太傅之事曰: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之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②

申叔時為太子教育開列了九種教本:《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楚莊王公元前613至前591年在位,當時楚國在文化上仍總體落後于北方中原諸國,“申叔時論傅太子之道”表明精英教育體系在春秋中葉已經相當成熟,教本也更加完善而系統化。

春秋諸侯各有國史,國史教育亦備受重視。《國語·晉語七》載司馬侯薦叔向為太子太傅曰:“羊舌肸(叔向)習於《春秋》。”悼公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後為晉平公)。叔向在春秋以博學聞名諸侯間,而其能夠出任晉太子太傅一職即在於精於國史。叔向教育太子彪,晉《春秋》當然是必備教材。晉國國史不僅保存和應用於本國,而且跨越國界成為他國學者的學習課本。《呂氏春秋·察傳》曰:“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③此處“《史記》”當為晉之國史,衛國人習讀之,且傳鈔造

①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樂”不以典籍視之。《禮》有書,自不必言。雖然《莊子·天運篇》已視《樂》為儒家“六經”之一,但後人多疑其僅為聲教,近年出土之郭店楚簡《六德》、《語叢(一)》的記載同《莊子》,可證《樂》作為儒家典籍確實是存在的,故李學勤先生在《中國學術的緣起——兼談孔子之“集大成”》的演講中說:“我們現在證明,當時確實有六經,而且《樂經》也應該有文字。”(見梁樞主編《國學精華編》,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25頁)

②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83—486頁。

③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第1537頁。

成誤讀，可證其已成書並流傳。鄭史的情況與之相似，《左傳·襄三十年》記鄭國執政子產與卿子大叔論政，引《鄭書》之論；《昭二十八年》記晉大夫祁盈因家族醜聞而求教於大夫司馬叔游，叔游引《鄭書》和《詩》以答之。其中之《鄭書》，即鄭國國史。從子產、叔游對《鄭書》的信手拈來推斷，其書無疑亦成為通行教本之一。

當然，《詩》、《書》等教本的形成絕非一次性完成。譬如《詩》，據前賢及今人王小盾、馬銀琴、趙逵夫、劉毓慶的研究^①，孔子之前的《詩經》文本編輯有兩次：一為西周宣王時期，所編入作品主要是大、小雅，“二南”和“三衛”；第二次為平王東遷後的春秋初期，新增篇章為“變風”、“變雅”和“三衛”之外的“國風”。徐正英認為，平王時期的《詩經》編輯當是最後一次以國家名義的修撰，“因為平王之後，‘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淪為傀儡的東周諸王，再也不可能代表國家意志詔告天下采詩、獻詩、編詩並將相關內容頒給各諸侯國了”^②。再如《書》，據饒龍隼、葛志毅、譚家健、李山等學者的研究^③，孔子之前《尚書》的編集成書至少有兩次：第一次為西周穆王時期，第二次為西周後期的厲、宣時期。《禮》、《樂》、《易》等教本的經典化當與《詩》、《書》相似。經典成為教本經過多次編纂，恰好證明了書籍成書必然存在一個過程這一基本規律。

春秋末期，孔子整理六經，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教本，這又是一個經典文獻成書的飛躍。

孔子整理“六經”並以之為教本，文獻多有記載。《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叢子·雜訓》亦曰：“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④在孔氏之前，“詩書禮樂”已經成為經典並有成書，孔子以之授徒復加修訂。《史記·儒林列傳》曰：“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史記·孔子世家》明載孔子刪“詩三千”為“詩三百”，《漢書·藝文志》又載其刪《書》為百篇並為之序。孔子晚年好《易》，讀之而“韋編三絕”，馬王堆帛書《要》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⑤《周易》卦爻辭本筮占之書，從孔子開始，“將《周易》文本化，並走了一條理性主義的詮釋之

① 參見王小盾《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詩六義原始》，東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213—309 頁；馬銀琴《兩周詩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5—399 頁；趙逵夫《詩的采集與〈詩經〉的成書》，《文史》2009 年第 2 期；劉毓慶、郭萬金《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5 頁。

② 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問題》，《文學遺產》2014 年第 5 期，第 22 頁。

③ 參見饒龍隼《〈書〉考原》，《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葛志毅《試據〈尚書〉體例論其編纂成書問題》，《學習與探索》1998 年第 2 期；譚家健、鄭君華《先秦散文綱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頁。

④ 王鈞林、周海生譯注《孔叢子》，中華書局 2009 年版，第 75 頁。

⑤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159 頁。

路”^①。故而班固《漢書·叙傳》曰：“慮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孔子修訂魯國史《春秋》，最早言此事者為《孟子》：“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史記·孔子世家》承其說，並有“《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之論。綜合來看，孔子整理古代經典應非虛妄，而其最主要的出發點，毫無疑問是在教育子弟。《論語》記錄，充分可證。

戰國之際，儒分為八，均以孔門正統自居，互相詰難，但尊孔氏為“先師”，奉“六經”為圭臬則為共同準則。孔氏修訂之“六經”作為成書定本，隨着儒學之興而風行天下。

經典因教育需要而大量成書，“成書化”又使之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詩》、《書》之引用即為顯例。關於賦詩（引詩），前人時賢論述已多，思想文化的意義探討之外，並以此考量《詩》的傳播方式和流布程度。^②《詩》有音樂性，樂工歌誦大抵是通過背誦，但諸侯公卿大夫及士人的賦詩言志和言語引詩所依賴的對《詩》的學習掌握，必然有成書的教本作為依憑。秦火以後，三百篇《詩經》獨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書·藝文志》），但“不獨在竹帛”並不是指全不在竹帛。據對先秦典籍特別是《左傳》引詩的考察，無論是引詩的頻繁程度、賦詩者的身份、地域還是賦詩言志的深刻意趣，都足以證明《詩經》傳播之程度。沒有經過編輯並得到普遍認可的定本，很難實現這樣的效果。特別是《詩》之影響在春秋中葉不僅遍及諸夏，且遠播蠻夷。《史記·秦本紀》載：“（秦）繆公怪之，問（由餘）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秦繆公本人於《詩》修養亦深，據《國語·晉語四》載，秦繆公宴請重耳、趙衰，秦繆先後賦《采芣》、《鳩飛》、《六月》三詩以釋其義，秦繆公子康公亦有“渭陽之思”。秦處西戎之間，當時文化上滯後於中原諸侯，然秦繆公竟有此論，單靠“耳聞”顯然是達不到這樣的認識程度的。又魯襄公十四年晉主盟會，欲拘捕戎子駒支，駒支據理以駁，賦《青蠅》之詩全身以退。清人勞孝輿對此論曰：“戎亦能賦，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③當時方言岐異極大，若無記為文字的成書，不可能達成如此的“詩教”。

《書》之情況與《詩》相似。《左傳·僖二十七年》載晉人趙衰已將“詩”、“書”並舉，《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靈王壅穀水”亦有同樣的記載。經過長時間的錘煉，《書》、《詩》同為經典之尊和最重要教本，且是當時傳播最廣的典

①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0頁。

② 夏承燾《“采詩”和“賦詩”》，《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毛振華《〈左傳〉賦詩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馬銀琴《周秦時代詩的傳播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清）勞孝輿《春秋詩話》，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頁。

籍之一,《左傳》的記載可以證明這一點。陳夢家、劉起鈞均有關於《左傳》引《尚書》的統計,但差別較大,馬士遠《周秦〈尚書〉學研究》最爲詳備:“《左傳》稱引《書》凡七十一次,其中,以孔子之前歷史人物口吻稱引凡三十次,以孔子口吻稱引凡四次,以與孔子同時代歷史人物的口吻稱引凡二十四次,以孔子之後歷史人物的口吻稱引無,以君子口吻稱引凡十三次。”^①對於引《書》者的籍貫,馬文亦有統計:“從稱引的區域性來看,周、魯、齊、晉、楚、衛、蔡、鄭、吳均有人稱引過《書》,其中,晉國最多,十六人二十四次;其次爲魯國,九人十一次;再次爲衛國,四人四次;楚國,三人四次;周朝,三人三次;鄭國,二人三次;齊國,二人兩次;蔡國、吳國,各一人一次。”^②《詩》、《書》在各諸侯國的傳播情況大致相埒。《書》是最典型的書面語文獻,沒有成書作爲傳鈔、學習、研究的依據,要想達成如此程度的“引經據典”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 百家言論的興起與戰國時期書籍的編纂

“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私家著述大規模出現。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曰:

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托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僞托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③

章氏此說,識見卓著。近代學者如羅根澤繼之以更加詳實的材料證明“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於戰國,前此無有”,已成爲學界共識。春秋後葉,諸侯兼併加劇,三卿分晉、田氏代齊的國際政治促使諸侯紛紛變法以圖強,改革以延世,人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接受教育則成爲時代所需人才的必備途徑。私家講學打破了貴族對知識的壟斷,學術觀念也從“述而不作”轉變爲“各思其道易天下”。隨着“尊王”思想的日漸淡漠,各種新思想、新觀念蜂擁而出。孔子之後,“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今聖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子·正名》)“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史記·孟子荀卿列

① 馬士遠《周秦〈尚書〉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4頁。

② 馬士遠《周秦〈尚書〉學研究》,第87頁。

③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3頁。

傳》)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知識階層在精神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舒展,從而迸發出無限的創造力。正如學者所總結的:“才士目擊世變,俱欲出其所學,以救時艱,以教後學。於是學者之興,雲蒸霞蔚;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周秦諸子遂形成我國學術史上之黃金時代。”^①

戰國時期的著述從一開始就基本上都是成篇載籍,並已開始被匯編為各種“成書”。《論語》編輯成書在戰國初期,可以視為諸子著述成書之濫觴。此後,作為一種特殊的編纂方式,弟子及後學纂述宗師之學說成為戰國潮流。《墨子》、《莊子》、《孟子》、《商君書》等戰國前中期的子書多是這一情況下的產物,《老子》、《孫子兵法》雖標榜春秋人作,實亦成於戰國後學之手。戰國中期以後,各種學說朱紫相奪、雅鄭相亂,競爭的需要使記錄一家言論更成為要務。稷下學宮之後,“有意著書”開始成為一種常態。“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史記·呂不韋列傳》)

此時書籍的形制規模,春秋時的教本已不能望其項背。比如作為教本的《魯春秋》僅一萬八千字^②,成書于戰國之《左傳》字數竟多達十八萬。再比如《禮》,《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禮經》之《記》近乎《經》之八倍。學者動輒數萬言的著述屢見不鮮:“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韓)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尸佼)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史記·呂不韋列傳》)

當時書籍生產、傳播也頗具規模,書籍出現多種傳鈔版本。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均有《緇衣》、《性自命出》(上博楚簡作《性情論》);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均有《五行》;慈利楚簡和上博楚簡均有《吳語》(上博簡作《吳命》);慈利楚簡

① 蔣伯潛《諸子通考》,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8頁。

② 《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徐彥疏引《春秋說》同之,但王國維《觀堂集林》計為一萬六千字。

之《大武》，上博楚簡之《從政》、《天子建州》、《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成王爲城濮之行》、《武王踐阼》均有甲乙兩種鈔本。一人甚至能够同時擁有一書的多種版本，如時間爲戰國中期偏後的郭店楚簡，僅《老子》一書便有甲、乙、丙三個鈔本。書籍的積聚與私人藏書也成爲可能，墨子、惠施、蘇秦均有大量藏書：“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墨子·貴義》）、“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莊子·天下篇》）、“（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戰國策·秦策一》）。近現代於戰國至秦漢墓葬出土之文獻，印證了文獻記載不虛。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書籍的編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載籍首先是一種物質結果，以竹簡爲主的載體形態決定了當時書籍的形制和編纂特點，即：“單篇”是先秦私人著述類書籍的原始形態。余嘉錫最早明確指出：“古人著書，多單篇別行；及其編次成書，類出於門弟子或後學之手，因推本其學之所自出，以人名其書。”^①傅斯年則進一步證明“戰國書除《呂覽》外，都只是些篇，沒有成部的書。戰國書之成部，是漢朝人集合的”^②。傅氏此論或過於絕對，因爲像孔子言論記錄一類文獻，雖然單篇獨立，但流傳之中必然相對集中，且有可能在漢代以前就匯編成書。裘錫圭的結論較爲合理：“一是古書編訂之前，其內容多以單篇形式流傳；二是古書即使在已經大致甚至完全編定以後，仍多單篇別行。”^③這也就是說，無論是否匯“篇”爲“籍”，此類文獻的主要流行形態仍然是單篇。這些單篇不僅被廣泛鈔錄，又被匯編爲不同的“書籍”，其中既有直接複製，也有改編增刪。

就匯編成書而言，較爲典型的例子是《管子》。《管子》的作者和性質，顧頡剛認爲是“一部稷下叢書”^④，馮友蘭認爲是“稷下學術中心的一部論文總集”^⑤。張岱年、胡家聰、白奚、池萬興、張固也等學者均贊成此說。稷下學宮始於田齊桓公午，止於秦滅齊，除去樂毅伐齊，歷時一百三十餘年，四方才學之士雲集於此，成爲天下學術中心。稷下著名學者有淳于髡、孟軻、彭蒙、宋鈎、尹文、慎到、接子、田駢、環淵、兒說、荀子、鄒衍、鄒奭、田巴、魯仲連等^⑥。他們至少分屬儒家、道家、名家、陰陽家四個思想派別。《漢書·藝文志》將《管子》列入道家，《隋書·經籍志》以下則列之於法家，這一分歧正是《管子》出於不同學派之手的最佳證明。檢《漢書·藝文志》至《宋史·藝文志》，《管子》八十六篇自劉向修訂至元代仍爲完帙，今本有六篇亡佚，但篇目尚存。管仲作爲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在齊國影響深遠。稷下學派興起之後，搜集管仲遺聞、闡

①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 古書通例》，商務印書館 2011 年版，第 211 頁。

② 傅斯年《“戰國子家”與〈史記〉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4 頁。

③ 劉嬌《言公與劉說》，綏裝書局 2012 年版，第 148—149 頁。

④ 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顧頡剛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8 頁。

⑤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7 頁。

⑥ 此據章啓群《星空與帝國——秦漢思想史與占星學》，商務印書館 2013 年版，第 97 頁。

述管仲思想的討論曾經轟轟烈烈地展開,《管子》正是這一學術活動的結晶,一種思想駁雜而形式整齊的新式長篇著作由此出現。

就縮編、改造、吸收而言,《左傳》也是很好的例子。《左傳》成書後甚為流行,改編、採納其內容者迭出。《漢書·十二諸侯年表》曰:“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據《漢書·藝文志》,此類典籍尚有《虞氏微傳》、《公孫固》、《張氏微》。李學勤論曰:“所謂‘微’,顏師古注言:‘謂釋其微指’,實則這些書的共同特點是鈔撮《左傳》,採取成敗,有的還采及《左傳》以外的內容。其論成敗,就是‘道義’的一種方式,只是為了便於讀者接受,篇幅較小,這可以說是漢初以前《左傳》學的一個傳統。”^①

分析而論:先秦書籍的編纂就形式而言,是匯篇成書;就內容而言,則無論是單篇別行還是匯篇成書,都存在大量的承襲鈔纂。出土文獻非常顯著地證明了這一情形。綜合當代學者對出土文獻的整理、分析,可以得出下表:

編入方式	被編文獻	編入之書
直接吸收	慈利楚簡《吳語》、上博楚簡《吳命》	《國語·吳語》
直接吸收	慈利楚簡《大武》	《逸周書·大武》
直接吸收	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緇衣》	《禮記·緇衣》
直接吸收	上博楚簡《民之父母》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家語·論禮》
直接吸收	上博楚簡《武王踐阼》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直接吸收	上博楚簡《鬼神之明》	《墨子·鬼神之明》
直接吸收	清華楚簡《程寤》	《逸周書·程寤》
直接吸收	清華楚簡《命訓》	《逸周書·命訓》
直接吸收	馬王堆帛書《九主》	《伊尹》65篇之一
直接吸收	八角廊漢簡《哀公問五義》	《荀子·哀公》、《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孔子家語·五儀解》
直接吸收	八角廊漢簡《六韜》	《太公》之“兵法”
改造後吸收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	《韓詩外傳》卷七、《說苑·雜言》
改造後吸收	上博楚簡《平王與王子木》	《說苑·辨物》
改造後吸收	銀雀山漢簡《唐勒》	《淮南子·覽冥》
改造後吸收	八角廊漢簡《保傅傳》	賈誼《新書》之《保傅》和《傳職》、《大戴禮記·保傅傳》

① 李學勤《帛書〈春秋事語〉與〈左傳〉的傳流》,《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4期,第5頁。

至於襲用段落、語句的情況則更為普遍。^① 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所出文獻於今為佚書者，大半有此種現象存在。儘管《漢書·藝文志》所錄文獻今已基本亡佚，出土文獻中相當一部分已無法在今傳文獻中找到印證，但通過歸納和推理仍可以得出：匯篇成書、承繼鈔纂是先秦載籍的主要編纂方式。這一情況與漢以後的書籍編纂是迥然不同的。

三 先秦載籍的存亡

文獻初起之時，“書於竹帛”本身就是一個選擇與接受的結果。選擇和接受的標準是早期文獻“存亡”的先決條件。

春秋時期大量成書的教本經典也是選擇的結果。春秋時期諸侯各自為政，精英教育亦皆如此，雖然《詩》、《書》、《禮》、《樂》等為經典通識教本，但也有不小差異。在篇目的選擇上，編纂目的和思想觀點會造成選擇的不同，有的即使所選篇目相同，所選內容也有較大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教本系統。今傳儒家“五經”教本只是眾多教本系統中的一種，大量出土文獻印證了這一點。如清華楚簡為戰國中期文獻，其主人顯然未受到儒家《詩》、《書》選本的影響。當代學者認為：“今傳《尚書》、《詩經》屬於儒家系統，清華簡的《詩》、《書》則屬於非儒家的流傳系統。……從清華簡的情況來看，在戰國時代，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詩》、《書》的儒家選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沒有很大影響。”^②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

《春秋》、《詩》、《書》的情況可資佐證。“春秋”乃當時諸侯國史的最普遍的通稱，墨子曾言見過百國《春秋》。晉《乘》、楚《檇杌》、鄭《志》，雖然名稱不同，亦皆國史之屬。楚太傅士匱以楚《春秋》教育莊王太子、晉大夫叔向因習於晉《春秋》而為晉悼公太子傅、魯人孔子以魯《春秋》教授弟子，諸侯以本國史為教本皆是慣例。然除魯《春秋》外，百國史記並無一書成為後世尊奉的經典教本。

《詩》為楚太傅士匱所用教本之一，在孔子亦然。孔子“刪詩”說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至唐孔穎達始提出異議，由此爭訟不已。反對“刪詩說”最有力的證據，是先秦典籍所引《詩》句絕大部分見於今本。但隨着先秦簡帛文獻的出土，這一理由已不能成立。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耆夜》中有西周佚詩《樂樂旨酒》、《輶乘》、《鼂鼂》、《明明上帝》、《蟋蟀在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有西周佚詩《周公之琴舞》十七篇^③、《芮良夫毖》一篇。當代學者考察後指出：“《周公之琴舞》九首組詩的發現，則首次從

① 詳見劉嬌《言公與剿說》(綫裝書局 2012 年版)的研究。

② 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光明日報》2013 年 11 月 14 日第 11 版。

③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有周公傲毖詩 4 句，成王自傲詩 9 首。徐正英、馬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組詩的身份確認及其詩學史意義》(《復旦學報》2014 年第 1 期)一文認為成王所作 9 首組詩全部是《詩·周頌》中的詩篇，其中的 8 首為逸詩，周公所作 4 句應該是《詩·周頌》所錄其 9 首組詩第一首的開頭四句。

正面為‘孔子刪《詩》’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範例。……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發現，使我們進一步相信，孔子應該確實進行過司馬遷所說的‘刪詩’活動。”^①並考訂該活動發生於魯定公四年孔子四十六歲之前。上博楚簡有《采風曲目》（題目為整理者所加），經學者研究，“通觀六簡，均有類似《詩經》中的篇名，但多不見於《詩經》，只有個別篇名可能與《詩經》有關，如《碩人》之於《詩經·衛風·碩人》即是”^②。重要的是，如《周公之琴舞》的取一捨八^③，可證孔子“刪詩”不僅刪除不同版本中的重複篇目，“還刪除同一版本中內容相近、主旨相類的不同篇目，每一類僅保留少量代表性的作品於《詩經》之中”^④。清華簡中尚有佚詩《芮良夫毖》，今傳《詩經》有“毖”類詩篇，此詩落選孔子《詩經》版本，原因當與《周公之琴舞》“逸詩”相同。從知識傳播和接受的角度而言，孔子修訂《詩》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這也是孔版《詩》廣泛流傳的原因之一。秦漢之後，《詩》未經孔子采入教本者，俱已不見。

《書》類文獻之境遇與《詩》相似。《尚書》本為上古時國家檔案資料彙編，經過多次編纂和修改，在春秋前期已經作為教本而存在。《漢書·藝文志》明載孔子將《書》類文獻整理成百篇規模：“《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馬王堆帛書《要》篇中記孔子言曰：“《尚書》多於矣，《周易》未失也。”李學勤認為“‘於’字原為‘闕’，訛作‘闕’，再省作‘於’。‘闕’和下句的‘失’，正好互相呼應”^⑤。孔子不僅修訂《尚書》，還以之教授弟子，《尚書》由此成為儒家經典之一。秦火之後，《尚書》雖大部散失，但主體尚存，而《汲冢周書》等《書》類文獻則基本消亡（《逸周書》的情況較為特殊。《漢書·藝文志》稱之為《周志》，古人以為乃孔子刪《書》之餘，但今人多認為其編於戰國）。新出土的清華簡以《尚書》類文獻為大宗，李學勤將其分作三類：“一種是真正的《尚書》，見於在今天傳世的《尚書》，或者由其標題或內容可以推定是《尚書》的；第二種是不在《尚書》，可是見於傳世的《逸周書》的；還有一些，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可是從其體裁來看是和《尚書》、《逸周書》是一類的。”^⑥這些“類《尚書》、《逸周書》文獻”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尹至》、《保訓》、《耆夜》，新近公布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之《殷高宗問於三壽》，應該都是未能入選主要定本而單篇別行的部分。

《春秋》、《詩》、《書》的“一存而衆亡”的境況是先秦時期教本文獻的縮影。其它類似的例子還有汲冢書之《竹書紀年》，清華簡之楚史《繫年》、《楚居》，上

① 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問題》，第21—26頁。

② 方建軍《楚簡〈采風曲目〉釋義》，《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39頁。

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有《周公之琴舞》組詩，該組詩“以周公還政、成王嗣位為其內容，存周公傲毖成王及群臣詩四句，成王自傲詩九首，且題目、短序、樂章標識俱全”（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問題》）。該組詩九首之第一首為今本《詩經·周頌》之《敬之》，餘八首為“逸詩”。

④ 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問題》，第21頁。

⑤ 李學勤《帛書〈要〉篇及其學術史意義》，《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⑥ 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4頁。